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

現實中國的三大命題

馮海寧



在「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際，衛生部日前已通報，四川省和山東省各確

診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這使我國內地甲型H1N1流感病例升至二例。加之，國際金融危機向不見底，中國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可以說，當前中國正面臨災區重建、疫情防控、提振經濟的三大緊急命題。

一方面紀念「5·12」大地震，承擔繁重的災區重建任務，一方面要密切關注流感病例，關注疫情在中國、他國的動向，還要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貿易保護、出口下滑，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刺激內需。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國家處境，與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此，面對當前三重困境，政府與公民都多了一份責任。

考驗前所未有

可能在有的人看來，這三大命題不僅是中國命題，美國等國家的流感疫情與應對金融危機的壓力更大，意大利等國也面臨地震災區重建任務。但是人口密集等特殊國情決定了，一旦疫情在中國蔓延，後果更嚴重；中國的經濟國情，如基礎差、底子薄、區域發展嚴重失衡以及資源短缺等，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中國經濟復甦的效率；而且，「5·12」大地震帶給中國的創傷，從全球及歷史角度看也是罕見的。當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時，考驗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急迫的命題無疑是流感疫情。二例流感病例的出現，意味着中國與疫情的距離更近了一步，傳播的機會比先前大增。在這之前，疫情似乎與我們很遙遠，但現在就不能用望遠鏡看待疫情了，從政府到個人，警覺意識顯然都要提高，從技術到制度都要升級。

儘管中國有應對SARS的經驗，利於防控流感疫情，但依然不可疏忽大意。這既是因為疫情在人口大國傳播的機率高，也是因為世衛組織日前發出的警告：如果目前正在快速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持續兩年時間，全球將會有超過20億人感染。世界銀行的一份評估報告認為，大規模流感疫情可能使全球經濟損失3萬億美元，拖累全球經濟下滑5個百分點。我們對流感不僅不能有絲毫放鬆，還要加倍防範。

其次是地震災區重建。地震一周年之際，應該如何紀念「5·12」大地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人重提公民精神，有的人想到了公民權利，還有的人推崇敬畏自然。但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是提供實實在在的災區重建思路和具體支持，以讓災區民眾早日回歸正常生活，這既是對生者的安撫，也是對死者的告慰。

災區重建有兩層含義，一是物質重建，二是精神重建。據四川省今年3月提供的數據，僅四川災區重建就存在1.3萬億元的巨額資金缺口。在地震受災程度僅次於四川的甘肅，災區恢復重建亦面臨四大困境：生存條件更加惡劣、貧困程度更加嚴重、農戶自救能力更加缺乏、重建資金更加短缺。可以說，災區重建任重而道遠。而且，災區官員自殺現象也提醒我們，心理干預和精神重建同樣緊迫。

復甦道路漫長

再者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與提振中國經濟。儘管有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開始復甦，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獨自復甦的道路有多漫長有多艱險卻無法預估。顯然，我們對目前的復甦數據不能盲目樂觀。因為目前的喜人局面主要是政府投資拉動的，而經濟的真正復甦在於社會投資。雖然以擴大內需提振經濟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對內需的培養卻是漫長的。

有人無奈地說，全球經濟下滑，流感疫情來得太不是時候。對中國而言，還多了一個災區重建的任務。筆者以為，在總的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當前這三大命題必然互相影響，這就需要我們分清輕重緩急，以民生的視角，合理運用各種制度工具，及時控制流感疫情傳播、提高災區重建效率、加強提振經濟力度。

齋藤在揀歷史破爛



就在日相麻生太郎結束訪華翌日，即2009年5月1日，日本交流協會駐台北事務所所長齋藤正樹，應邀前往台灣嘉義中正大學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高調宣揚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他一度表示是代表日本政府立場，並說其根據是《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由此引起兩岸同日本之間一場外交風波。眾所周知，作為一個國家駐外代表在公開場合發言，只能代表政府立場，不許摻雜個人意見，這是規則。故而，台灣當局立即向日本提出抗議；5月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表示強烈不滿，中國政府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

齋藤對其演講題目秘而不宣，以突然襲擊方式在公開演講中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耐人尋味。「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觀點，在日本政界和右翼分子中間是相當普遍的，只是正式公開發表十分罕見。齋藤在公開演講中，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不是一時興起，更不是「個人失言」，乃是有備而來，其意圖是不言而喻的。這點，在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過後給台灣駐日代表馮寄台的一份正式聲明中可以得到證實。他在聲明中表示，日本政府的立場是，根據《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日本放棄所有對台灣的權利、權利名義與請求權，所以對台灣法律地位問題，日本政府沒有獨自進行認定的立場。在他的聲明中，竟然隻字不提日本政府堅持遵循《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和《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的規定，這些國際公認有效的國際法，一致規定台灣和澎湖歸還中國。他卻刻意根絕非法無效的《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規定來說事。顯然，他不是收回「台灣地位未定論」並道歉，而是繼續為「台灣地位

未定論」論證和辯護，居心叵測。

「台灣地位未定論」，始作俑者是美國。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認為台灣在圍堵中國大陸上戰略地位顯要，便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企圖將台灣交由聯合國或美國託管，成為圍堵中國大陸「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因此，由美國主導，刻意漠視歷史事實——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爾反爾，背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將台灣、澎湖歸還中國的規定，於1951年9月8日非法炮製了《舊金山和約》，1952年4月28日生效，中國被排除在外。

《舊金山和約》共七章二十七條，其中第二章第二條規定：「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由於措詞模糊，沒有明確指出把一切權利交給誰，致使有各種不同解讀。1967年9月8日，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訪問台灣期間，公開鼓吹「台灣歸屬未定論」、「台灣是日本的防波堤」，對台澎又有領土野心。「台灣獨」分子也喊：「台灣主權未定論」，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要求「制定新憲法，更改國號」，「成立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這樣，「台灣地位未定論」便出現了三種版本，即美國版、日本版和「台灣獨」版。三種版本，各懷鬼胎，各有企圖。「台灣地位未定論」，曾經激起兩岸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無比憤慨，遭到全中國人民與海外中華兒女強烈譴責。

《舊金山和約》已無價值

其實，《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規定，只能承繼《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物歸原主，台灣歸還中國，這是順理成章之事。它本身並不包含「台灣地位未定論」，後來引伸出「台灣歸屬未定論」、「台灣主權未定論」，那是引伸者別有居心。

有人說，由於沒有提到放棄主權字眼，因而導致「台灣主權未定論」。其實，主權也是權利，放棄一

俄梅普體制面對新挑戰

吳非 胡逢瑛



美國對於俄羅斯發展中的戰略干擾是行之有年的，其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在媒體上挑起領導人之間的心結。現在梅德韋傑夫和普京在政府改革上分頭出發，美國媒體進行大量臆測性和干擾性的報道，俄羅斯梅普體制是否能夠應對危機和美國的騷擾，年底應會有一個基本結論出來。

當美國遇到危機後，非常奇怪，美國媒體最關心的國家竟是俄羅斯。

美國媒體認為，俄羅斯正在面臨1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嚴重、物價上漲、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美國情報顧問公司發布的風險評估報告認為，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可能會帶着遺憾離開，而普京將會重新領導俄羅斯。另外，俄羅斯聯邦主體內的分裂主義將會盛行，未來出現獨立意圖的地區將佔聯邦主體的20%。

不找危機替罪羊

美國始終存在一幫唱衰俄羅斯派，而且這一派的人都相當有背景，其採用的手段，和當初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詆毀克格勃的手段是一樣的。梅德韋傑夫和普京整體運行的智囊團隊是一套班子，那麼，俄所面臨最新的挑戰就是：如何在否認前任的基礎上渡過難關。在蘇聯時期，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都犯過同樣的錯誤。美國在戰略上的陰險和長遠可想而知。

美國對於俄羅斯發展中的戰略干擾是行之有年的，其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在媒體上挑起領導人之間的心結。因為俄羅斯領導人和美國的最大不同就是，美國總統在任四年或八年之後，就會基本退出世界政治舞台，而俄羅斯的領導人則不會，直到死亡為止。

俄羅斯民衆長期以來都普遍認為，克格勃在美國媒體的污蔑下，都變為殺人機械的代名詞，但蘇聯時期的領導人中安德羅波夫和俄羅斯前總統普京都出自克格勃，而且蘇聯和俄羅斯大量的領導人都和克格勃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克格勃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一個跨部門協調的單位，是保證國家安全協調機制。其實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是和克格勃相對應的單位，但部門級別低很多，在協調力度上比克格勃薄弱，經常在組織活動中出現問題。污名化克格勃是中央情報局的主要任務之一，並且這一任務在冷戰中基本得到完成。蘇聯克格勃的主要問題是濫權，並且對於大量的涉外和學術機構及教授進行監聽等活動。

現在俄羅斯政府內部存在一個共識就是：在危機面前，俄羅斯的發展不能夠將前任所指定的戰略作為替罪羊，俄羅斯官員需要在更大範圍內實行菁英入閣的計劃。

在這樣的共識下，總統梅德韋傑夫開始邀請一些政治積極分子和36個非政府組織進入克里姆林宮。俄

羅斯現在適度放開自由，而且對於官員實行財產申報。普京則致力於軍隊規模的縮減。儘管俄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成員古德科夫對此嘲笑為：官僚會對收入申報規定一笑置之，沒有人去核對。其實這是俄羅斯膚淺的菁英的一貫看法，常常希望每項措施都有效，人民期望更高，但效果更差，甚至會爆發革命。這樣在體制內進行改革，或者稱為改良，這應該是沙俄和蘇聯時期的傳統。只要俄羅斯認真執行改革，那就會產生革命和政變。

三個辦法助經濟

俄羅斯的經濟形態本身就是能源型的，中國的主要是廉價製造型，這一本質的形態在未來二十年間都很難徹底的改變。中國需要做的是如何擴張自己的戰略空間，但這絕對不等於是軍事設備的擴張。戰略空間擴張的速度要快於軍事設備。中國內部軍事企業常常希望發展到像美國一樣的水平，獲得大量預算，讓軍工企業過上好日子。但問題是中國軍事設備的提升和戰略空間的擴張常常是兩碼事，並不合拍。

俄羅斯能源經濟遇到的問題必須採用三個辦法同時進行：首先是國民必須節衣縮食，過緊日子，而不是苦日子；然後縮減政府的規模和權力的範圍；最後，要增加整體菁英參政的規模。對於這三點，梅德韋傑夫和普京都在分頭去做。反倒是中國在這三點上都是在反向進行，這些值得關注。

最近，俄羅斯總理普京在一些內部會議上就指出一些問題，就是在安德羅波夫時代制定的很多蘇聯的戰略，現在看來都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戈爾巴喬夫夫人為了清除葛羅米柯這樣前朝官員在蘇聯政府的影响，而刻意採用立場一向親西方的謝瓦爾德納澤出任外長。葛羅米柯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從來不明顯地依隨任何特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派別，只是經常充當一個使者和發言人。葛羅米柯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在蘇聯遇到困境時，要縮小戰略空間；在順境時，加快擴張的速度，但一定要符合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



國電新疆阿拉山口風電場總體規劃裝機容量1千兆瓦，分四期建設。目前一期工程正在建設，預計10月底竣工投產。圖為一名工程技術人員從風車葉輪旁走過。

在「公開性」改革中戈爾巴喬夫和夫人賴沙常常扮演雙簧，但在大原則基礎上確是常常錯誤。舉例來講，在東歐推行民主化進程後，東歐國家接受援助的國家從蘇聯一家增加為許多西方國家，而且西方國家的援助多為現金，使得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和菁英都非常滿意，生活愜意，而且對於民主化進行了不切實際的宣傳，使得東歐國家甚至包括蘇聯人都認為，只要推行民主化，冷戰就會消失，大家的生活猶如進入天堂。包括後來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都天真的認為，遠離蘇聯的朋友之後，美國和俄羅斯就會成為自然的盟友了。

改革上分頭出發

蘇聯時期對外援助的特點，是在地進行基礎設施的援助，因為蘇聯專家認為這樣可以保持蘇聯在該國的長期影響。但謝瓦爾德納澤重新調整了當時蘇聯的外交政策後，由對抗西方的傳統路線改為尋求合作與和解，同時減少了對國外反政府武裝的援助。這樣蘇聯放棄了自己援助的特點，而且在不熟悉的現金援助裡和美國抗衡。

現在梅德韋傑夫和普京在政府改革上分頭出發，美國媒體進行大量臆測性和干擾性的報道，俄羅斯梅普體制是否能夠應對危機和美國的騷擾，還需要觀察，到年底應該會有一個基本結論出來。美國對中國採用和調導向性措施，讓中國忙於經濟問題中，不能自拔。作者為大馬副教授，博士

建金融強國需領軍人才



某種意義上，金融版圖之爭就是金融人才規模與層級之爭。中國在建設一流金融強國的過程中，迫切需要培育和造就一大批具備國際化視野、全球化資本運營意識並且熟練駕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高端金融人才。

在哥倫比亞大學受過系統金融學訓練並有華爾街和世界銀行工作經歷的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張新，日前履新央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長，這被認為是國家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人才布局之一。聯想到去年證監會副主席屠光紹空降上海，任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長，不難看出，中央已將人才戰略作為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步驟。

欠缺戰略人才

其實，國家對上海的金融發展定位以及相關管理團隊安排，只是中國勾勒金融發展藍圖的縮影。越來越具全球競爭視野的中國政府認識到，既然金融已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那麼中國在邁向一流經濟強國的過程中，就必須擁有與自身實力和發展潛力相匹配的金融實力。強大的資本市場，世界級的銀行與保險體系，比肩紐約和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以及擁有國際貨幣本位幣，是中國在未來20年裡力爭實現的戰略發展目標。從當前的國際金融形勢發展來看，目前正是中國強化金融競爭力、縮小與美國和日本之間金融發展差距的難得時機。

只是應當看到，儘管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有關市場主體正在各個層面為打造金融強國付出各自的努力，業已取得的進展也令人有理由樂觀，但撤開建設金融強國的國際政經約束條件不說，國內金融人才尤其是戰略人才的欠缺，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制約金融強國建設的最大瓶頸。

與紐約和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金融人才規模與層級方面差距明顯。上海的金融從業人員儘管已有20萬人，佔全市常住人口數的1%多一點，但以紐約、倫敦的標準來看，上海金融從業人員數量明顯不足。倫敦和紐約金融從業人員佔就業人員的比例均為11.5%以上，而上海目前的比例只有2.2%，達到國際水準的金融人才不到1萬人。其中高級管理人才隊伍不足500人，註冊金融分析師(CFA)更是奇缺。儘管國內高校每年的金融專業畢業生數以十萬計，但由於金融人才培養與市場有效需求嚴重脫節，造成了金融人才一方面缺口幾十萬，另一方面卻是大量金融專業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尷尬局面。少數通曉金融前沿知識的潛在金融專才，或者留學海外，或者到外資金融機構任職，真正願意扎根中資金融機構的不是很多。

當然，上海近年來積極延攬在海外工作的華人金融專才，希望這些具有國際工作經驗、掌握最新金融技術與管理的高級人才能夠回國工作，推動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中國尤其欠缺能夠領軍金融強國建設的戰略性金融人才。所謂戰略性金融人才，是指具備國際化視野、全球化資本運營意識並且熟練駕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高端金融專才。如一流的銀行家和金融家、金融風險管理師(FRM)、金融理財師(CFP)和金融分析師(CFA)以及高級金融英語人才等。就中國的情況來說，這些戰略性人才還應該熟悉國情並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培養引進並舉

戰略性金融人才的欠缺凸顯中國培養和引進財經專才與一流銀行家的緊迫性。其實，中國是有條件培養和引進戰略性金融人才的。就戰略人才培養來說，目前要做的是整合已有的相關培養資源，着力引進一流師資，並加強中資金融機構與國外同行的戰略合作與交流，學習對方的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另一方面，應該利用全球經濟出現嚴重衰退、美英金融機構高端人才流動率增加的有利時機，將目光鎖定那些在國外一流金融企業擔任中高級管理與技術崗位的華人金融專才，以較具國際競爭力的薪酬條件吸引其來中資金融機構工作，以彌補中國在戰略人才存量的不足。

基於此，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地要積極創新金融人才工作機制，完善金融人才政策體系，建立健全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金融人才資源配置機制，逐步實行企業經營管理人才的市場化配置和契約化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利於金融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積極營造有利於高端金融專才華工作的金融生態環境，以這些金融領軍人物進得來，留得住。作者為副教授，博士

王基文

切權利，就包括放棄主權。

中國政府曾經多次發表嚴正聲明，堅決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舊金山和約》既排除中國參加，中國又堅決反對，按照國際法，對中國沒有法律效力，是非法無效的。《維也納條約》第三十四條規定：「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或權利。」再說，前蘇聯和印度兩大參戰國都拒絕簽字，四個主要戰勝國中英美蘇，只有美英簽字，嚴重殘缺不全，它豈有國際法效力？！而《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二戰四個主要戰勝國中美英蘇都簽了字，又是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全面接受的條件，在戰後領土主權歸屬問題上，日本政府只能無條件嚴格遵守，無任何談判選擇的權利。因此，他們是國際公認的真正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法文件。

《舊金山和約》本來對中國就沒有法律效力。在1972年2月28日中美簽訂的《上海公報》寫道：在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樣，《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是否包含「台灣地位未定論」，已毫無意義了。在1972年9月29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之後，由於日本承諾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故而，《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是否包含「台灣地位未定論」，也無引用價值了。

當信守《中日聯合聲明》

「台灣地位未定論」，在上世紀60年代曾經囂張一時，1972年之後，隨着中美《上海公報》、《中日聯合聲明》的簽訂，就沉下去，支離破碎，體無完膚了。而齋藤竟然不顧《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規定：日本國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卻出爾反爾仍然根據非法無效的《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規定，荒唐地重提臭名昭彰的「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種揀歷史破爛的行為，只能成為世人笑柄。